

《国学四十讲》 (雁斋读书漫笔之七)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210093)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时,忧心忡忡地告诫当日的青年读者道:“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若诸君而吐弃本国学问不屑从事也,则吾国虽多得百数十之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吾惧其于学界一无影响也”。他还预测说:“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梁任公此论发于1902年。二十一年后,他在南京应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邀请时,指明国学研究两途径为“整理国故”的文献之学,“内省”与“躬行”并举的人生之学。在讲演最后,他自信地说:“诸君听了我这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

百年光阴倏忽而过。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又内乱,当年就学于东南大学英文系,深受张士一、吴宓、梅光迪、柳诒徵、吴梅、陈去病等名师教诲的陈汝衡,在1985年中秋时节有诗曰:“国学荒芜今最惨,广陵文物声光闇。”(《赠韦明铎》)

其实,岂止是“广陵文物声光闇”呵?1992年底,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卞孝萱先生在《国学大师丛书》之一《柳诒徵评传》的序言中披露,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钱宏先生“东奔西走,竟然找不到一位不但愿意而又有能力撰写《柳传》的作者”时,中国当代学界的可悲性也就被烘托到了极致。

到了世纪末,获致长足发展的“泰西文明”,更挟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优势席卷而来。此时的“西

方美人”已是多年媳妇熬成的“婆”,开始在中华大地上颐指而气使了。移风易俗至于刻下,“本国学问”已难兴波起澜、歆动性喜追逐人文时尚和社会新潮的“新青年”了。随着老成凋零,屈指宇内,为梁任公所期待的足以“发明本国学术思想”的人才,已如凤毛如麟角。于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唐振常先生撰文质疑道:“国学可废乎?”他认为:

“国学”包括儒学,但绝对不只是儒学,这是用不着讨论的。提倡国学,自然也包括儒学在内。国学绝非只是糟粕,如同绝非皆是菁华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有历史的特殊背景和条件,其所欲打倒和破坏的旧文化,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新文化运动倡导诸君子选择孔学为打击对象,有时代的动因,打之时,不分青红皂白,一锅而煮之,彼时容或不能斥其非。既打之后,波平浪定,仍不加清理,缺乏一个建设阶段,遗害乃及于后人……其时反对新文化运动之士,看来主要是反对这种绝对化,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也赞成输入西方新文化,并没有抱残守缺。《学衡》派诸君子,多是早期留学西方人士,他们一生讲国学,也讲西学,《学衡》提出的口号“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并没有错,而且理应如此。

语为中肯之论。既然“国学”事关中华文明香火之存亡绝续,遂有有识之士奋起,遥承学统,先后有《国学大师丛书》(张岱年总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国学大师论国学》(胡道静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之编,以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1992年)、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2008年)之设,感动一时舆论。至于方克立先生更在2008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发言提出,亟需“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他认为“新世纪出现的这次国学复兴

[作者简介] 徐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运动,合乎时代之潮流,顺乎人心之所向”,因此他呼应袁行霈教授的观点,提出建立“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和“前瞻的态度”是学术界“基本的品格”,而“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学,必将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见2008年8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专刊2008年第22期)

日来得见卞孝萱先生偕其弟子胡阿祥教授主编之《国学四十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巨册,不觉鼓而舞之矣。胡教授之后记云:“20世纪末,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后,总结、弘扬国学,成为一股潮流,一批国学大师的经典著作重新印行,并在学人大受欢迎。然而,时至今日,在大陆高等教育中,国学的讲授却未成系统,不少高校甚至废而不讲。这种情况,势必影响今后学术的发展,影响一代学人的素质。”其言忧患,先得吾心。

所谓“国学”,乃就比较而言者,特指“中国的学术”,意在表示与“西学东渐”之西洋学问方法,有本土、舶来之别。谭正璧在《国学概论讲话》(光明书局1933年版9月版)导言中说:

“国学”又名“国故学”,亦名“旧学”,系对“西学”“洋务”“新学”而言。在海运未通之前,中国闭关自守,国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国而无世界,以为中国即是世界。一切的学术,既没有国界可分,故无从产生所谓“国学”。后来海运大开,中西交通日繁,西洋学术文化,因之东渐,于是产生了所谓“西学”,随即也有了所谓“国学”。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就是国学,“西学”就是西洋传来的文化学术。“中”、“西”对称,大约在这个时候才开始……

所言甚是。因此,卞孝萱先生的自序为本书开题道:“国学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门类繁多。我们编写的《国学四十讲》,不像目前市场上流行的那些国学概论、国学常识、国学要览等书,只有少数几门。而是汇集了四十门,其中有热门,也有冷门,有显学,也有绝学”。通览案头此编,依次可见版本学、本草学、避讳学、辨伪学、博物学、讠纬学、敦煌学、方志学、风水学、佛学、红学、辑佚学、校勘学、金石学、经学、老学、郦学、龙学、律学、名辨学、墨学、目录学、农学、谱牒学、尚书学、诗词曲格律学、书画学、术数学、数学、通鉴学、文选学、文字学、物候学、姓氏学、训诂学、

音韵学、輿地学、职官学、诸子学、传注学。

卞先生梳理并总结出上述国学有关部类成型的六个主要源起,有因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郦学”;有因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有因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有以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有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迷信与科学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等。他认为:“国学是立国之本,民族之魂。整理、发掘国学之精华,继承、弘扬其优良传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之发展……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研究国学的同时,吸取、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国学四十讲》在编纂上甚有章法。大抵一篇之内,首先是释名,接着概述学问来路和学科形成简史,然后叙说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再举要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系以基本入门书目与主要参考文献。因此一编在手,集萃学术菁华,自是开卷有益。

试以与文献学有关的“目录学”为例,徐雁平博士先释目录与目录之学,然后缕述了汪辟疆、陈垣、程千帆有关目录学功用的意见,接着介绍了目录的结构、书目的类型,以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和《书目答问》四种目录学代表作,附述了鲁迅、胡适、傅斯年、马裕藻、黄侃、汪辟疆、钱穆、顾颉刚、程千帆诸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开列的书目,并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评点。其中附笔指出,读者不可受流行观念影响,对朱熹、曾国藩两氏心存偏见,“要真切地了解他们,倒不妨读读《朱子语类》和曾国藩的家书,从中定能感受到他们温和的人性,他们的活泼、可敬与可爱。语录与家书中谈读书读何书的言论相当多……”,可谓言简意赅。

至于“校勘学”,武秀成教授在简单叙述“校勘释名”、“校勘的目的与原则”之后,列举了“误字”“脱文”“衍文”“误倒”四种类型,接着——举例说明导致讹、脱、衍和倒置的原因,阐述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交代了校记的普通作法,最后以数语心得作结:“前人感叹,校书如扫落叶。学习校勘,亦无止境。”又可谓言尽旨远。

观《国学四十讲》,微感缺憾者其有两端:一则作为“国学通览”“国学手册”类型的工具之书,主编们不妨有意识地贯彻目录学方法论,要求撰稿者务作各科基本经典著作之解题。若果如此,且以十种为限,则撰稿者们自多一处衡量和评说前人学术成果的话语域,读者则

相应地多得了一份步入国学门径的推荐书目。计全书四十科目可总得四百种,本书不啻多一重劝学导读功能矣!

如版本学乃是知行合一之学,全书开篇之《版本学》列有主要参考文献多至八种,惜其一半为教科书式概论,且北京大学图书馆姚伯岳先生之《版本学》已在2004年被北京大学出版社修订为《中国图书版本学》行世……此类小疵一经“解题”,则其瑕自见,不烦外人批评也。

一则书中四十二位作者,仅标明所在供职单位未免过简。知人论学,实事求是,无论博士硕士,教授讲师,均以附述其学术简历为是。

三年前,卞先生序称编纂本书的用意,“是普及国学知识,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几千年来学术之真相及其变迁之大势,展现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年轻一代热爱祖国的感情,也为有志于治国学者带一段路,以便进一步地深造。”因此拟议中的“续编”,还将包括甲骨学、简牍学、兵学、泉学、玄学、易学、申韩学、管子学、楚辞学、春秋学、尔雅学、禹贡学、道教内丹学、中医学、庄子学、董学、沈学、徐学、诗学、诗经学、诗品学、杜诗学、唐诗学、赋学、曲学、词学、古文学、考据学、礼学、理学、天文学、历法学、年代学、三通学、四史学、史学、职官学、法令学、法医学、工艺学、考工学、营造学、水利学、刑幕学等。如此条分缕析,细大不捐,于厚望其成之余,不觉叹其可贵而难能。

往昔钱穆先生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撰《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指出学术上“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因“和合”而中国学术素崇“通人通儒”,但自1949年以后,“中国旧文化、旧传统、旧学术,则已扫地而尽。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中国古书,仅以新式眼光偶作参考翻阅之用,再不求融通体会,亦无再批评之必要”,他慨乎言之道:“必先西方,乃有中国,全盘西化已成时代之风气,其他则尚何言?”“一切学术,除旧则除中国,开新则开西方。有西方,无中国,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亦如是而止矣。”无独有偶,1951年的陈寅恪在广州康乐园中,念及北京海王村旧书肆而有“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之句,慨乎其叹,其用情亦悲甚矣。

陈、钱两位国学大家当年忧虑之事,刻下已大显于世。因此,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们内在的一种认同民族文化的渴望逐渐强烈了起来,并外化为新一轮的出书热。于是五六年来,先后有曹伯韩著《国学常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刘兆祐等编著《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孔祥铤著《国

学入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邱燮友等编著《国学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乃至《“大家国学”书系》和《大众国学读本》的陆续问世。

尤其是《“大家国学”书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与《大众国学读本》(岳麓书社2008年),真是无独有偶,相映成趣。试看各自的前言阐述:

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的《国学概论》……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

(李学勤《“大家国学”书系》总序)

国学本自汉字始……学者国学,由宋明理学到清代考证学流进包罗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里,流进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的研究及其著作中;大众国学,由宋元平话到元明杂剧、明清说部,和伴随着它们的小册子《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家诗》《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笠翁对韵》等等,流传民间……大众国学,是大众学习的国学,学习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大众国学著作致力于清顺、通俗;学者国学,是学者们研究的国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治国平天下”,学者国学著作追求博雅、精深。

(罗维扬《“大众国学读本”》编订者言)

真是春花秋月,环肥燕瘦,各有其妍,自有胜场,自应传播于世。因此说来,愈知《国学四十讲》及其续编,取法乎“大众国学”到佼佼学者之“大家国学”间的知识层次,是为当代国学爱好者乃至中国文化学术传承者编著的一部基础性读物,一部深入浅出的门径书,确如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所说“嘉惠士林,功在千秋”。因此建议主编,当本书续编告竣之时,不妨在《中华文化及其演变与传承》题下,做一融通和合之“大块文章”以为全书导读,则于国学传承则谓有功也,于当今读者则为有幸也。

(收稿日期:2008-07-22)